

# 中泰高校合作办学项目的现状分析及趋势探究

##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al Trends of Sino-Thai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丁了了<sup>1</sup>

Liaoliao DING

泰国孔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中国西南大学国际学院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Khon Kaen University, Thailand  
International Colleg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ina  
cqdll61@163.com

韩瑞宝<sup>2</sup>

Ruibo HAN

泰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西南大学国际学院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Thailand  
International Colleg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ina  
hrbthai@163.com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3846624>

**摘要** 中泰高校合作办学作为跨国教育合作的一个重要模式, 在推动两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及教育资源共享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本研究综述了中泰高校合作办学的政策背景和实践发展, 分别从地区分布、类型层次、办学模式、专业设置及运行现状等方面梳理办学项目的设立与运行。分析指出, 合作中存在的主要挑战包括生源质量不达标、培养目标不明确、理论实践比例失衡、教师数量偏少、沟通机制缺失、监管体系不健全和科研协同创新不足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 本研究提出通过把控招生标准、优化专业定位、统筹课程对接、强化师资建设、创新合作模式、对标国际标准和完善顶层设计等措施, 旨在提升合作办学质量, 为两国高等教育合作提供更坚实的支持和保障。

**关键词** 中国; 泰国; 高校; 合作办学; 现状分析

**Abstract** Sino-Thai collabor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serve as a significant model of transnational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which is crucial in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haring academic resour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study reviews the policy background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Sino-Thai university collaborations, detailing their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across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levels of cooperation, operation modes, program design, and current status. The analysis identifies key challenges in the collaboration, including inadequate student quality, unclear educational goals, an imbalanced theory-practice ratio, insufficient teaching staff, lack of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inadequate regulatory systems, and insuffici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research.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study proposes measures such as controlling admission standards, optimizing academic program positioning, coordinating curriculum integration, strengthening faculty development, innovating cooperative modes, benchmark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improving top-level

---

收稿日期: 2024-06-11

作者简介: <sup>1</sup> 丁了了, 泰国孔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应用语言学博士研究生, 中国西南大学国际学院教师。

<sup>2</sup> 韩瑞宝, 泰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东方语言学博士研究生, 中国西南大学国际学院教师。

项目基金: 2023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一般课题“中泰高校合作共建中文专业现状及发展路径研究”(项目号: 23YH61C)。

design. These measures aim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provide more robust support for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words** China; Thailand; Universities; Cooperative Education; Status Analysis

## 一、引言

中泰两国作为友好邻邦，始终秉承“中泰一家亲”的理念。中泰关系率先从睦邻友好提升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文化相通、经济互补、战略对接，促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领域的深化合作（阙阅、徐冰娜，2020）。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泰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在东南亚地区名列前茅（何妍，2019）。高等教育机构是泰国国际化的重要参与主体，中国是其主要合作对象之一（崔亚楠、文雯，2022）。

自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简称“一带一路”）以来，东南亚作为核心区域在亚太地区扮演重要角色，教育交流与合作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民心相通的重要路径（阙阅、徐冰娜，2020；李宝贵、庄瑶瑶，2023）。东南亚中文传播在全球中文传播体系中具有大众性、典型性、引领性，东南亚高校在各自国家中文教育体系中承担重要的高端中文人才培养角色（吴应辉，2019）。在东南亚国家中，泰国是全球首个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在校学习中文人数居全球首位（中国驻泰大使馆，2022）。2014年，泰国教育部颁布的《中文教学发展规划》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泰国中文教学的指导方针。2016年，中国教育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提出教育合作的目标，包括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疏通政策瓶颈、实现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等。泰国中文教育的蓬勃发展不仅在“一带一路”区域内起到了积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而且对于全球中文教学的丰富研究案例积累及区域化高质量发展规律的总结具有重大意义。

## 二、中泰高校合作办学项目概况与运作机制

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一种跨境教育模式，主要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种实现形式（陈慧荣，2020）。本研究所探讨的“中泰高校合作办学”（简称“合作办学”），特指中国大学和高等职业院校“走出去”与泰国相应院校合作、以泰国学生为主要培养对象的办学项目。

### （一）中泰高校合作办学的历史与现状

中泰两国自建交以来，教育交流和合作日益频繁且紧密。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两国通过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发布与实施，促进了两国在高等教育合作中的深化发展，为中泰合作办学项目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和框架保障。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首次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鼓励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并鼓励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与外国知名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办学。2007至2012年，中泰两国相继签署了《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和《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定》，有效推动高等院校学分互认，并承诺在教育合作协议和学历、学位互认的框架下，加强学生交流及教育机构和汉语教学方面的合作。在此期间，

中泰教育交流与合作主要通过开设孔子学院、大学院校合作学位项目以及留学生互访等方式进行(Yang, 2012; 阚阅、徐冰娜, 2020)。例如, 2006年中国西南大学与泰国孔敬大学合作共建孔子学院, 并于次年签署了中文专业联合培养项目协议。此外, 中国西北大学和泰国宋卡王子大学也相继开展了中文专业联合培养项目。至此, 高校合作办学成为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关键领域之一。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泰国“4.0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 合作办学在职业教育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2013年, 两国教育部签署了《关于加强在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旨在促进两国职业校企合作, 深化和拓展职业教育交流。2016年, 中国教育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鼓励各职业院校利用自身的职业教育优势资源, 与泰国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自此, 中泰职业教育通过交换生、联合培养等形式, 在交通物流、旅游管理、电子商务、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了一系列“中文+职业技能”合作办学品牌项目。2015年,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班派工业社区教育学院启动高铁专业人才联合培养项目, 并于2019年合作共建了全球首家高铁鲁班学院。2018年,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先后与泰国因他猜商业学院和春武里技术学院合作, 采用“中文+专业技能+产业”教学模式, 至今已连续开展六届现代物流管理专业人才联合培养项目。2023年7月, 西南交通大学与泰国孔敬大学联手共建天佑铁道学院, 并于同年11月派出首届学生。这些项目为中泰各职业技术领域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会中文、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与此同时, 随着两国高等教育合作的日益深化, 泰国政府鼓励泰中两国高等教育机构进一步开展有关课程开发、教学、社会科学、科技研究等领域的合作, 加大联合培养人才力度。2022年, 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与泰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签署了《关于加强中文教学合作的框架协议》, 其中“泰中大学语言合作计划”旨在推动“3+1中文教师发展”等中泰高校合作共建中文专业。2023年, 泰国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与云南省教育厅签署滇泰职教联盟合作协议, 双方在“中文+职业教育”课程、在线学习资源开发等方面合作, 旨在推动中泰职业教育人才联合培养。综上所述, 通过中泰各项教育政策的落地与实施, 两国高校间逐渐形成了多渠道、多领域的合作模式, 实现了两国教育资源的互补与共享。

## (二) 项目设立

从纵向上看, 合作办学项目的进程包括设立、运行和发展的三个阶段。本节将重点探讨设立和运行这两个发展阶段, 对项目基础和现状进行梳理。其中, 地区分布、类型层次、办学模式和专业设置作为项目设立的四个关键因素, 共同决定了项目的深度和广度。

### 1. 地区分布

中泰高校合作项目超半数泰国高校集中于中部地区, 东北部、北部和南部地区参与度较低, 而中国高校合作方多来自广西、云南等西南省区(崔亚楠、文雯, 2022; 阚阅、徐冰娜, 2020)。造成这种不均衡分布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策的推动和区域战略的布局。例如, 广西于2011年发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到2020年将广西建设成为面向东盟的教育国际交流与

合作高地，大力培育面向东盟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2010）。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截至2019年，广西约有30所院校开设泰语专业或泰语选修课程，云南约有29所院校，是中国开设泰语专业及泰语辅修课程最多的两个省（李灵珠，2019）。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中泰高校合作办学在西南地区的集中发展。目前中泰职业教育合作的地域结构形成了“津冀-江浙地区、两广地区、云贵川地区”三个中心，各具优势但未能辐射周边；其中，只有两广地区开展了办学结构较为全面的中泰职业教育合作，其他两个中心的合作缺乏中职学校的参与，导致办学结构不全（李婧如，2022）。

## 2. 类型层次

合作办学项目类型可分为非学历教育和学历教育两种模式。学历教育项目从层次上主要集中在本科和专科，分为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两大类，办学主体分别为普通高等院校和职业高等学校。这两种教育形式的合作办学，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互补。

普通高等教育的学历合作办学项目涵盖本科和硕士两个层次，且本科项目占八成以上（阚阅、徐冰娜，2020）。这主要是因为本科层次教育具有“成本投入低、优质生源稳定”的优势，加上部分中方院校硕博点缺乏等原因，合作办学重心偏向于较为基础的本科阶段的人才培养（汪颖、郭强，2023）。非学历合作办学项目的典型代表是由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支持的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这些项目由中泰双方合作共建，办学主体包括大学和中学。根据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2024年最新数据，自2006年泰国首家孔子学院——孔敬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以来，截至2024年，泰国已建立了17家孔子学院和11家孔子课堂。

中泰职业教育合作涵盖非学历教育和学历教育，主要集中在高职和中职层次。中方的办学主体主要是高职院校，高职以上层次的院校几乎没有参与，而中职层次的院校参与度极低，合作相对较少且尚未形成规模（李婧如，2022）。因此，本研究在讨论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办学时，将主要聚焦于高职层次。

## 3. 办学模式

在办学模式上，现有的合作办学主要采用“嫁接式”和“融合式”（何妍，2019；郑婷，2017）。“嫁接式”合作办学以跨国合作的教育路径为特点，由中泰双方的高校共同参与课程的设计和实施，提供实体空间、管理支持和学生服务，实行“X+Y”运作（X和Y分别代表在两国两校学习的年限），通过学分互认以及学历、学位联/互授，确保教育的连贯性（郑婷，2016, 2017；陈慧蓉，2020；张成霞、胡彦如，2016）。在此模式下，学生在中泰两国高校间分阶段完成学业，而不涉及教育机构的实质性流动。因此，该模式被广泛应用于中泰联合培养项目。其中，“联合/双/多学位课程”作为“嫁接式”典型实践形式之一，凸显了中国教育机构国际化办学的重要方向（阚阅、徐冰娜，2020；吴应辉，2021）。目前，中泰大学间的合作办学项目通常实行“3+1”或“2+2”模式。例如：泰国孔敬大学与中国西南大学合作共建的对外汉语本科项目采用了“2+2”模式。该模式下，学生首先在孔敬大学完成一年的语言预备课程，随后在西南大学进行两年专业学习，最后回到泰国完成一年的实习和论文撰写。

完成全部课程后，学生将获得双方学校授予的学位和毕业证书。

在“中文+职业技能”领域，“嫁接式”联合培养也取得了显著成果。例如，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班派工业社区教育学院联合培养的轨道交通专业项目，采用“1+2”办学模式联合培养高铁技术技能人才(杨红秀，2022；驻泰国经商参处，2019)。为了有效保障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同步提升，该项目通过中方学校、孔子学院、泰方学校“三位一体”模式确定留学生培养目标。具体而言，学生在泰国的第一年，除了在泰方学校学习专业基础知识课程，还在孔敬大学孔子学院参加汉语强化培训，随后赴中国进行两年的学习和实践。

此外，“融合式”合作办学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其特点在于将中泰双方的课程体系和教师资源整合为一体。例如，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自成立以来，共开设13门汉语通选课，这些课程已被纳入孔敬大学的学分体系，在“课程定制—教师授课—课程评估”方面实现了中泰双方资源的有效融合。在职业教育领域，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大城技术学院合作成立的全球首家鲁班工坊便是产教融合的成功典型案例之一。该项目在“共建职业教育实体机构、实施学历教育与技术培训”方面，融合了中泰教育机构与企业的合作，推动了中泰合作办学模式的创新。通过校企三方共同设计并实施标准化、项目化的国际培训课程，提供实体空间、管理支持和学生服务，实现了教育与产业需求的紧密对接，提升了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和就业竞争力。

#### 4. 专业设置

高校间合作办学项目的专业设置一般主要集中在中泰两国及合作院校的优势专业领域，且与“一带一路”建设需求密切相关(何妍，2019)。这些项目主要集中于语言类专业，其次是经贸类(阚阅、徐冰娜，2020)。在中泰大学间合作办学方面，语言类院系间合作模式是合作办学的主要形式之一(叶艳，2010)。合作专业侧重于语言类，其中，中文专业有26个，占58%(崔亚楠、文雯，2022)。

在中泰职业院校合作办学方面，双方联合培养的人才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机械与制造工程、交通运输与铁路工程、农业与环境工程、旅游广告等领域(洪桂治，2024；吕景泉、李力，2021；杨红秀，2022；于兰平等，2022)。截至目前，重庆市下属职业院校已完成30余门中泰职业教育国际化课程或“中文+职业技能”课程标准认证(李志峰，2024)。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大城技术学院成立的首家鲁班工坊已开设六个国际化专业，并陆续纳入泰国国民教育体系(吕景泉、李力，2021；于兰平等，2022)。此外，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成立的中泰申谷学院，其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已获得泰国教育部正式认证，并成功输出8门课程资源，其中4门课程获得泰国教育主管部门认证(米红林、白丽丽，2024)。

### (三) 项目运行

#### 1. 运行现状

中泰大学间合作共建中文及中文相关专业起步较早，在提升学生语言能力和教育国际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丁丽虹(2013)以泰国孔敬大学与中国西南大学合作的对外汉语教学本科专业为例，指

出该项目由两校的教育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人文学院）和孔子学院共同管理，并由两校的代表组成课程管理委员会。然而，该项目在教师监督、学生生活关注以及师资经验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足。谢文婷和许光爱（2015）以泰国素叻他尼皇家大学与云南师范大学的“2+2”合作办学项目为例，指出该项目利用目的语环境和中方教师资源，提高了学生的汉语水平。但该项目在课程设置合理性和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方面存在不足。郑婷（2016, 2017）基于温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3+1”办学模式，对参与该项目的中泰双方教职员进行问卷调研，反映出该模式存在课堂理论课比例过高、实践实习课程偏少的问题，且专业教师缺乏多学科背景，师资较为单一。此外，郑婷强调了项目质量、高校管理层的支持、教师参与程度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阶段的特点对中外合作办学成功的关键影响。林浩天（2020）对比分析了泰国艺术大学汉语教学专业的“4+1”本土培养和“2+2+1”联合培养模式。研究发现，联合培养模式在课程设置、教学理论、培养目标及教学策略方面更为全面，尤其在引入现代汉语等基础课程方面，为学生提供了坚实的语言基础。然而，这一模式在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上存在不足，难以满足未来汉语教师的职业需求；中泰两国高校间的课程衔接不足，导致教学内容重复，影响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

近十年，中泰职业教育合作办学发展迅猛，中国职业院校在泰国设立了19所海外分校（洪桂治，2024）。鲁班工坊作为职业教育合作办学典型代表，其相关研究能提供有力借鉴。吕景泉和李力（2020）探讨了鲁班工坊在亚洲的建设过程、品牌创建及推广应用，重点分析了泰国鲁班工坊的实践。于兰平等（2019）进一步聚焦于泰国鲁班工坊的发展历程、功能定位和成效，展示了其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中的示范效应。该工坊采取“0.5+2+0.5”的培养模式，入学和毕业前各半年在泰国学习，2年在中国学习，毕业后同时获得两校毕业证书。董锐（2022）通过对“鲁班工坊”合作办学模式的研究，指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存在多重失衡，主要表现为时间序列、人才供给与需求、制度标准与国际化之间的失衡。同时提出了应对策略，包括制度创新、路径创新、教学创新和源动力创新，强调制度的顶层设计、国际化协同以及教学模式的创新对提高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性。

合作办学从开设到运行离不开两国教育战略合作政策的支持。刘军华（2024）认为，在职业教育合作办学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借助政府的顶层设计力量，以“政校企”协同共建模式，创新“政府引导、企业主建、院校主教”的留学生学徒培养模式。然而，尽管泰国政府注意到了开展合作办学项目的价值，目前仍主要依靠各高校自发的行动，政府主导和带动的项目还较为有限（何妍，2019）。崔亚楠和文雯（2022）的研究发现，合作办学项目在学科专业、合作层次和地区布局上的不均衡，这主要是由于当前中泰高校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主要依靠双方政府和教育部门签订双边协议。这种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等教育机构的自主活动空间。

## 2. 现状述评

综上所述，中泰合作办学广泛采用分段培养模式，现有合作项目在学生流动和高校合作关系上均已取得重要进展。然而，在项目管理与执行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瓶颈，主要表现在监督制度和沟通机制

缺失、生源质量不高和学生管理不善、学科建设欠缺和课程设置单一、师资力量薄弱和教学质量不高以及经费资源有限等方面(丁丽虹, 2013; 何妍, 2019; 林浩天, 2020; 汪颖、郭强, 2023; 谢文婷、许光爱, 2015; 闫斌等, 2020; 郑婷, 2016, 2017)。这些问题导致合作途径、形式以及层次较为单一,合作质量不尽如人意。此外,中泰高校的伙伴关系主要服务于两国的发展战略,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高等教育机构的自主活动空间。中泰合作办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合作模式,这使得其未来发展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挑战。要实现更高水平的合作,需要在制度设计、管理时间和资源整合方面进行深化、创新和改革。

### 三、合作办学优势与现存问题分析

#### (一) 现有优势

##### 1. 中泰教学资源的高效整合

合作办学高度整合了两国的教学资源,实现了教育资源的互补共享和特色学科的优势扩大。该合作模式不仅融合了中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而且借助中国严格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促进了教育资源多元化的引进和现代教育理念的应用。这种模式在课程设置、教学目标和实践教学方面实现了一致性,确保了课程的连贯性。此外,通过高等教育资源的国际化流动,该模式有助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且适应本土环境的复合型人才,并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学术和职业发展路径,加深了中泰教育交流。

##### 2. 课程内容与体系的相互贯通

在合作办学中,特别注重将课程内容与真实教学环境紧密结合,帮助学生克服使用第二语言学习专业课程的语言障碍(丁丽虹, 2013)。这种做法将语言学习从传统的课堂环境转移到实际应用的场景中,极大地提升了汉语教学的实用性和效率。这样的教学模式不仅节省了学习资源,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加生动、实际的语言学习体验,有效地提高了语言技能的应用水平。相较于传统的本土培养模式,合作办学模式的长效多元合作机制和互补性强的发展规划不仅满足中泰双方的长远利益,而且为学科国际化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李宝贵、庄瑶瑶, 2023)。

#### (二) 现存问题

目前,合作办学相关研究所反映出的现存问题主要集中在生源质量、学科建设、课程设置、师资队伍、沟通机制和监管制度这五个方面。

在学生生源层面,存在生源质量把控不严、语言水平达不到专业课程要求等问题。该问题直接造成学生入学后学习主动性滞后、教师难以实现既定教学目标,进而影响项目声誉,并导致后续生源质量持续下降,形成恶性循环。在职业教育合作办学项目中,中国高职院校普遍要求学生在赴华前达到HSK 三级或四级水平。然而,泰国职业院校的学生每周汉语课时仅为 1-2 学时,难以达到赴华学习所需的汉语水平。尽管一些学校在赴华前组织短期的集中强化培训以提高汉语水平,但由于短期内学生

的听力和口语能力以及专业词汇量很难快速提升，这种集训模式并不能完全解决学生在华生活、学习时遇到的语言障碍。

在学科建设层面，问题主要集中在内涵式发展机制缺乏和科研协同创新不足。一些高校往往将合作办学视为“引进优质资源，补齐自身短板”的途径，而忽视了强强合作、提升强项的需求。因此，在结合双方优质学科时，往往停留在对原有学科设置的简单复制上，对学科融合中所产生问题的总结和对其他成功案例的借鉴尚显不足，缺乏系统性的内涵优化创新发展机制，导致现有学科设置不够科学合理。相较于人才培养合作，双方在学科能力发展上的配合难度更大，这种科研协同性的缺乏限制了学科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在专业定位层面，存在专业名称不统一和培养目标不明确的问题。以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为例，部分泰国高校将该专业命名为“对外汉语（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而另一些泰国高校则沿用泰国本土培养模式的名称“汉语教学（Chinese Teaching）”。这种命名上的差异不仅反映了各高校对专业定位的不同理解，还导致了在培养计划和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分歧。此外，尽管泰国教育部门明确要求教师需持有教师资格证上岗，但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双学位项目的培养方案中，未能具体设定教师资格证这一要求，反映了培养目标不明确的问题，影响了项目的整体质量和实施效果。

在课程设置层面，存在理论与实践比例失衡、双方课程衔接度缺乏、专业课程内容滞后以及与专业培养目标切合度低等问题。语言、教学和职业技能都是高度实践导向的学科，其实践内容应与理论知识紧密结合。然而，部分项目未能与学校或企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实习基地，导致实践内容与专业知识脱节，造成实践能力脱离岗位需求。此外，运行时间较长的合作办学项目往往在教材更新和课程内容上相对滞后。教材陈旧直接导致内容和难度无法与赴华学习后的教材相匹配，从而使双方课程衔接度缺乏。专业课程内容未能反映最新的行业发展和学术研究，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和职业发展的需要。这些问题共同导致了课程与专业培养目标的切合度低，影响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竞争力。

在师资建设层面，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专任教师数量偏少、教师学科背景单一以及外籍教师流动性高。首先，合作办学项目与本土培养共用同一批师资，造成教师教学任务重，难以保障教学质量。其次，由于合作办学教育普遍具有企业化运作的特点，泰国高校借助与中国高校合作建立的孔子学院，邀请孔院中方教师参与在泰的教学工作。然而，孔子学院提供的中方教师所遵循的人事制度与传统的终身教师聘用制相异，导致中籍教师任期与教学任务衔接不畅，这种情况对合作项目的教学连续性和稳定性造成了影响。此外，对于专业类或职业类汉语学科，其特点是既包含语言教学又包含特定专业或职业技能，而既懂语言教学、又具有相关学科背景的“双师双语型”教师却十分短缺，导致这些学科在师资建设方面面临更大挑战。

在沟通机制层面，合作双方的各层级均缺乏系统有效的沟通机制。双方管理层的语言沟通障碍、主要行政官员人事的频繁变动，导致双方在合作项目的形式和内容上存在着一定分歧，招生政策的更

改甚至会导致项目中断。同样，双方教师缺乏合作教学机制，导致合作中的协调困难和教学进度不一致。

在办学质量层面，问题主要在于缺乏健全的监管体系以及与国际标准的对标。合作办学项目对学生学习质量、教师教学计划及执行情况缺乏必要的监督力度。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尤其在对标国际标准及国际评估评价结果方面，各办学机构有待进一步提升的完善。

## 四、中泰合作办学发展建议

### (一) 把控招生标准，保障生源质量

生源质量是保障合作办学延续性的先决条件。泰方院校需严格制定并执行准入标准，以避免因生源质量不达标而导致的恶性循环。首先，在项目初期，双方需制定具有吸引力且切实可行的教育目标（闫斌等，2020）。此外，可在学生入学前或赴华前设立统一的语言能力考核标准，以确保学生具备必要的汉语沟通能力。同时，考虑到学生的语言基础和专业需求的差异性，中方院校可视具体情况，为高职学生安排适量的语言预备课程，或将语言课程与职业技能课程同步进行。通过对学生的生存汉语和职业技能专业术语进行有针对性的语言辅助和实践强化，从而有效保障教与学的实效性。

### (二) 整合学科优势，优化专业定位

优势学科配对和明确专业定位是提升合作办学质量的首要步骤。因此，中泰双方应加大优质教育资源融合力度，聚焦一流学科建设，优化学科布局，将各自优势学科资源进行整合。同时，应避免简单复制原有学科专业，促进优势学科在地化发展，构建系统性内涵优化创新发展机制，以科学合理的方式推动学科融合（郭强等，2021）。此外，双方在科研协同创新上需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协同创新体系，提升学科能力和科研水平。泰国教育部门还应制定统一的专业命名规范和明确的培养目标，确保培养方案的完整性和实施效果，从而提升合作办学的整体质量。

### (三) 统筹课程设置，理论结合实践

课程设置的科学统筹与协调是合作办学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双方应共同商讨、制定和调整课程大纲，合理科学分配语言与技能课程，保障课程无缝衔接。在课程设计上，需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发展需求和合作办学的特点，合理平衡全球视野和本土需求，巩固课程设计、教材编写与教学实施的主体地位。双方应引入行业专家和学术研究成果，定期衡量教材和课程内容的时效性和前沿性，提升课程的实用性。除此之外，建立稳定的合作实习基地和具有专业针对性的实践能力考核标准也至关重要，以确保实践内容与专业知识紧密结合，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竞争力。

### (四) 明确师资要求，建设师资队伍

建设一支国际化、高水平、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是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其关键在于稳定师资队伍和提升教师参与度。这里的师资队伍包括授课教师、教辅人员及项目管理人员。针对“双师双语型”人才缺乏和队伍不稳定的问题，可采取“外引进、内培养”的应对措施，通过建立健全

全科学的师资聘用制度和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保障教师权益，从而稳定师资队伍（郭强等，2021）。此外，通过增加在出国进修机会和共享学术资源的投入，能有效助力教师个人成长以及教学科研经验提升，从而更好地激发教师对合作项目的积极性和投入度。

#### （五）建设资源平台，创新培养模式

建设资源平台和创新培养模式是实现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引入慕课（MOOC）、智慧课堂等现代教育技术，科学搭建智能化学习平台，为学生远程交互学习和线上线下同步教育提供有力支持（Yodpet, 2023）。在现有合作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开发互联网在线课程、创新结合工学、落实校企“双元”育人机制等方面，促进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革新，推动双方互融互通、构建产教融合基地，有效实现中泰高校在教学管理、人才培养、学术交流方面的优化（杨红秀，2022）。

#### （六）优化沟通机制，推动顶层设计

多层次的沟通机制和完善的顶层设计是合作办学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项目决策层（大学董事会）、执行层（主管领导及教师）以及参与层（新、老学生）的沟通交流都发挥重要作用。在中方与泰国当地政府、院校和企业开展合作时，孔子学院和鲁班工坊等合作办学平台始终持续发挥着积极的桥梁作用，促进双方的深度沟通与合作。在两国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层面，应加强顶层设计，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推动两国高等教育合作。政府作为“引导者”“推动者”和“监管者”，需通过战略规划、政策制订、监管调控等措施，构建积极的产教融合体系，并完善高校教育合作的相关制度标准。此外，合作还应建立互访制度，增加政策扶持力度，如资助跨国合作办学、减免校企合作税费、增加留学生资助等（杨红秀，2022）。

#### （七）对标国际标准，注重品牌办学

在培养质量和高校声誉方面，中国高等教育对泰国学生的吸引力尚待加强（崔亚楠、文雯，2022；Wen、Hu，2019）。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需求的增强，如何应对发达国家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也已成为中泰合作办学项目面临的关键问题。为确保项目的延续性，合作办学应积极对标国际标准，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此外，合作办学应构建可复制办学模式，打造国际化、特色化办学品牌，通过品牌效应提升国际教育与交流领域中的影响力与认可度。

### 五、结语

中泰高校合作办学项目的成功实施，是两国在教育领域深化合作的成果体现，同时也在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树立了教育合作典范，尤其是为面向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地缘优势显著的东南亚有关高校的合作办学提供了高度可被复制和推广的参考。在此基础上，中泰高校合作应进一步深化研合作领域，扩大教育合作内容，强化合作研究。通过横向比较和总结不同项目的阶段性特征，纵向评估合作办学对学生职业发展的长期影响，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结合，持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确保合

作教育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这不仅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实践经验，也助力了区域内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优化。

然而，对于不具备地缘优势的合作办学项目，相关合作方仍需加大多元化发展的力度，以灵活应对文化差异、政策壁垒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应进一步注重现代教育理念与技术的创新应用，优化人才培养和教学模式的优化，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这一进程既需要合作各方在办学理念和模式上进行适应和调整，也要求在政策设计与基层实践之间实现有效衔接。政府应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引导高校根据区域特点探索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合作方案。借鉴中泰高校合作办学的成功经验，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推动合作办学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必定会在实现全球教育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助力良多。

## 参考文献

- Wen, W., Hu, D. (2019). The emergence of a regional education hub: Rational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oice of China as the study destination.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3(3), 303–325. <https://doi.org/10.1177/1028315318797154>.
- Yang, R. (2012). Internationalization, regionalization, and soft power: China's relations with ASEAN member countries in higher education. *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7(4), 486–507. <https://doi.org/10.1007/BF03396951>.
- Yodpet, W. (2023). China-Thail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ost Covid-19 Era: 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Roi Kaensarn Academi*, 15(2), 284–295. <https://so05.tci-thaijo.org/index.php/pimjournal/article/view/255486>.
- 陈慧荣. (2020). 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概念框架研究——基于境外办学规范发展的视角. *重庆高校研究* 8 (5), 79–90. <https://doi.org/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0.05.007>.
- 崔亚楠,文雯. (2022). 中泰高等教育合作交流进展与挑战. *高校教育管理* 16(1), 100–109. <https://doi.org/10.13316/j.cnki.jhem.20211224.009>.
- 丁丽虹. (2014). 中泰合作高校对外汉语专业教学管理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402&filename=1014261671.nh>.
- 董锐. (2022). “鲁班工坊”合作办学模式面临的现实挑战及应对策略.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2), 124–129. <https://doi.org/CNKI:SUN:HJZK.0.2022-02-018>.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2010).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https://web.ict.edu.cn/law/s/gangyao/n20130911\\_5078.shtml](https://web.ict.edu.cn/law/s/gangyao/n20130911_5078.shtml).
- 郭强,张舒,钟咏. (2021). “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路径反思. *高校教育管理* 15(03), 35–44. <https://doi.org/10.13316/j.cnki.jhem.20210329.11>.
- 何妍. (2019). 泰国高校合作办学路径观察. *西部学刊*, (06), 18–24. <https://doi.org/10.16721/j.cnki.cn61-1487/c.2019.06.003>.
- 洪桂治. (2024). 泰国“中文+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与前瞻.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3), 50–59+114. <https://doi.org/10.16067/j.cnki.35-1049/c.2024.03.004>.
- 阚阅,徐冰娜. (2020). 泰国教育制度与政策研究. 人民出版社.
- 李宝贵,庄瑶瑶. (2023). 中文纳入东盟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特征、优势及启示. *教育科学*, (02), 64–70. <https://doi.org/CNKI:SUN:JYKO.0.2023-02-009>.
- 李婧如. (2022). 中泰中等职业教育合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云南大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TEMP&filename=1022061002.nh>.
- 李灵珠. (2019). 中泰教育合作交流研究——基于2014–2019年5年时间的分析. *西部素质教育*, (18), 166–167. <https://doi.org/10.16067/j.cnki.35-1049/c.2019.18.001>.

- g/10.16681/j.cnki.wcqe.201918104.
- 李志峰. (2024年5月3日). 重庆职教何以“出海”. *重庆日报*. [https://epaper.cqrb.cn/cqrb/2024-05/03/002/content\\_rb\\_331609.htm](https://epaper.cqrb.cn/cqrb/2024-05/03/002/content_rb_331609.htm).
- 林浩天. (2020). 泰国艺术大学汉语教育专业4+1模式与2+2+1模式对比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云南大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2202&filename=1020766613.nh>.
- 刘军华. (2024). 政校企内外协同、理虚实一体的留学生学徒培养模式实践.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05), 150–15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489X.2024.05.150>.
- 吕景泉,李力. (2021). 亚洲鲁班工坊项目建设、品牌创建及推广应用研究. *职业教育研究*, (10), 4–12. <https://doi.org/CNKI:SUN:JLKF.0.2021-10-002>.
- 米红林,白丽丽. (2024). 终身教育服务“一带一路”视域下的跨境人才培养研究——以“中泰申谷学院”为例. *豫章师范学院学报*, (02), 100–104. <https://doi.org/CNKI:SUN:LCYY.0.2024-02-019>.
- 汪颖,郭强. (2023). 教育强国背景下“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问题窥探与优化路径. *高校教育管理* 17(6), 114–124. <https://doi.org/10.13316/j.cnki.jhem.20231102.011>.
- 吴应辉. (2019). 东南亚汉语教学研究. *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 (02), 3. <https://doi.org/CNKI:SUN:GZZY.0.2019-02-002>.
- 谢文婷,许光爱. (2015). 云南来华留学生合作办学项目的探索与实践——以云南师范大学泰国苏拉塔尼团队“2+2”项目为例. *新教育时代电子杂志(教师版)*, (22), 193–194.
- 闫斌,何旭辉,岳阳,胡广辉. (2020). 高等教育走出去风险辨识与对策——以中泰合作办学为例. *创新与创业教育*, (02), 118–122. <https://doi.org/CNKI:SUN:CXYC.0.2020-02-020>.
- 杨红秀. (2022). 后疫情时代中国——泰国职业教育共同体构建研究.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04), 6–11. <https://doi.org/CNKI:SUN:SZXZ.0.2022-04-002>.
- 叶艳. (2010). 中泰高校合作办学的优势及其模式. *世界教育信息*, (11), 77–79. <https://doi.org/CNKI:SUN:JYXI.0.2010-11-036>.
- 于兰平,申奕,黎志东. (2022). 世界首个鲁班工坊——泰国鲁班工坊研究. *职业教育研究*, (12), 5–9. <https://doi.org/CNKI:SUN:JLKF.0.2022-12-001>.
- 张成霞,胡彦如. (2016). 泰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经验与实践——以高校国际合作学位项目调查为例. *东南亚纵横*, (02), 87–93. <https://doi.org/CNKI:SUN:DLYZ.0.2016-02-015>
- 郑婷. (2016). 汉语教育专业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探析——以温州大学中泰“3+1”项目为例. *现代职业教育*, (30), 28–29. <https://doi.org/CNKI:SUN:XDZJ.0.2016-30-014>.
- 郑婷. (2017). 中外合作办学关键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温州大学“3+1”中泰合作汉语专业的观察. *考试周刊*, (61), 1–3. <https://doi.org/CNKI:SUN:KDZK.0.2017-61-002>.
-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国经商参处. (2019). 中泰合建高铁鲁班学院揭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th.mofcom.gov.cn/article/zxhz/201904/20190402852069.shtml>.